

Und kam in die Welt der Büchermenschen

集书人

〔德〕彼得·魏特哈斯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集 书 人

法兰克福书展前主席魏特哈斯
二十五年任内的秘辛

〔德〕彼得·魏特哈斯 著
赖雅静、张淑惠 译

商 務 中 書 館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书人/(德)彼得·魏特哈斯著;赖雅静,张淑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6556-6

I. 集… II. ①卫…②赖…③张… III. 出版工
作—文化史—德国 IV. G239.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519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集 书 人

法兰克福书展前主席魏特哈斯
二十五年任内的秘辛
〔德〕彼得·魏特哈斯 著
赖雅静、张淑惠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556-6

2009年4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5

定价:29.00元

目 录

话说从头·····	3
“柏林坑”·····	7
意外的出线·····	14
勇渡汪洋·····	41
书展与媒体·····	55
我担任主席的第一次书展·····	63
中国·····	73
拉丁美洲·····	82
勒恩山区的小屋·····	94
主题馆的开始:拉丁美洲·····	109
迁展之争·····	118
我是左派吗?·····	128
文学经纪人中心的登场·····	138
献给赫尔曼·舒茨的颂词·····	148
身份认同·····	162
与美国的版权贸易之争·····	180
印度·····	194
五十岁生日后·····	229

“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之崩溃·····	261
主题国的登场·····	278
摊位问题·····	317
拉什迪事件·····	335
新方案和后果·····	347
拉什迪,没完没了·····	358
政变方式的改革·····	382
从主办人到主持人·····	397
新古腾堡星系·····	421
亚洲之行·····	434
总结·····	454
“集书人”的后记·····	472

并非爱，而是怀疑——

自由的第一个代价——让世界得以进步。

抗拒它而活，你就活在迷惘中；

伴随它而活，生命便是一场奇幻之旅。

彼得·乌斯蒂诺夫(Peter Ustinov)爵士

话说从头……

古希腊是人类文明记忆的基石，传说中，九名缪斯女神的母亲摩涅默许涅(Mnemosyne)，就是记忆女神。而开俄斯的西蒙尼德斯(Simonides von Keos)这位西方史上第一名以过人记忆力著称者，则有过下面一段轶事：

在纪元前五百年，开俄斯的西蒙尼德斯参加一场盛宴，与众多宾客围桌而坐，席间他被人从宴客厅中唤出。才刚踏出宴客厅，厅内的天花板立时塌落，将在场所有宾客击毙。死者家属见到的尸体已残缺难辨，幸好仰仗着诗人西蒙尼德斯过人的记忆力，记得灾难前哪名宾客坐在何处，因此能协助死者家属，使这些难以辨识的尸体身份大白。

公元二〇〇〇年三月一日，我在法兰克福任职的时间即将告终，而我却于两天前在勒恩山区(Rhön)结冰的道路上跌了一跤，将左腕关节摔断了。绑着应急的厚厚绷带，我才得以在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出席在法兰克福阿拉贝拉饭店(Arabella Hotel)为我举办的惜别会，接受同事与其他法兰克福友人的祝福。当时在所难免盛传一说，说我就是无法放手，手才会跌断……

当我在离职后好不容易脱离混沌的旋涡再度站起来时，当我离开了书展、职务、差旅和所有书界人士后，环顾四周只剩下我一人，仿佛自己突然站在一处空荡荡的地方。日落，日升，从此处直到天际唯有“当下”。

那些我当作朋友看待的人都在离我遥远的地方；而在我近处的人，从前我几乎未加关注。过去，我没有时间关心他们，唯有对一个女人的爱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拥有再站起来的勇气。

而今三十多年来不断驱赶着我的一切骤然沉寂。环顾四周，人群来来往往，我注视他们的脸孔，有的回望着我，有的微笑，其他人寒暄问候，而另一些人则擦身而过。我在勒恩山区的草地上仰望天际；朵朵云彩往天边飘移，我再也无法逃遁到未来，我已被判到“当下”，再无可改变了。

这时，我那一直滞留在“当下”的身体也来叩访了。在繁忙的那些年头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因为我的心总在别的地方，不断追求着未来的某个目标。而此时，我的膝盖也出现了膝关节半月板的问题。我看了骨科医师，他认为应该立即开刀。但手术后，痛楚更甚于前，我必须拄着拐杖走路——先是手腕，现在是腿。

更惨的还在后头：我的家庭医师发现有地方不对劲，他将我转诊给泌尿科医师。先是诊断出恶性肿瘤，接着是糖尿病、心律不齐。就这样，我在医院待了两年，而其间还曾经因为开刀造成严重感染。

这段期间，我完全遗失了自己。在一场为时五小时的手术

过程中,有人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和钱包从病房里偷走了。电脑里有我所有的个人银行账户资料、密码以及我大部分的书稿;钱包里有各种证件、驾照、行照和信用卡。我还存在吗?失去了对我意义重大的工作,没有了过去围绕在我身边的朋友,遗失了所有证件,而直到之前几乎总是顺利运作的身体现在也状况百出。人类的存在到底何在?

我那长久以来悠游其中、属于书客族的世界,再也不再为我而存在了;而证明我存在的各种正式文件也无影无踪。我究竟还是我自己吗?而那些我托付给不安全的电子媒介的,我在人生之旅贡献的实质证明也同样遗失了。我如同瘫痪了一般呆呆瞪着病房的天花板。

等到有一天,我终于能抛开小病房的局限、宏观大局时,我做了个重大的决定:我出院,取消了与各个医师后续的诊约——这两年来他们不断从我身上诊断出一种又一种不治之症。我走出户外,先是散步,接着开始当时正流行的“北欧式健走”(Nordic Walking)。起初时间短暂而且小心翼翼,接着慢慢拉长时间。我从医师手中夺回了对自己生命该负的责任。

当我在公园里行走时,每天都会经过一棵健壮的橡树,这棵橡树的树干极为粗壮,就连两人联手也无法合抱。我向这棵树致意,在内心里想象它那遒劲又健康的树干:我望着那紧紧抓住地面、往道路下方伸展的树根。这棵树至少已经八十岁了,始终散发着生机勃勃的健康。一天又一天,每天我都会来向它致意。

情况逐渐出现转机,这也是我个人“身份”复得的外在表征:除了我的健康状况外,有一天,一名荷兰籍机师从阿姆斯特丹来

电话,告诉我他在法兰克福转机时捡到了我的钱包,里面有我所有的证件,甚至连信用卡都还在。数星期后,有名年轻的土耳其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买回我的笔记本电脑。我与这个人约了几次私下会面,最后在美茵大教堂(Mainzer Dom)前,我以五百欧元向这名年轻人买回了自己的电脑。依据他的说法,这部电脑是他在跳蚤市场以一辆脚踏车换来的。电脑里的资料大部分还在。

我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某些病征完全消失,我又活过来,完全回到“当下”,未来不再能诱惑我了。每天早晨看到天亮、太阳升起我就感到无比喜悦!我从床上起身,向这一天致敬。

今日回想过往的林林总总时,并不像有天花板塌下来那样压得难以辨认。然而我对熟人、友人、各种友谊的记忆,却总是一再被众多后来发生的事件、后来认识的人所掩盖,或是因为对痛苦事件的排拒压抑而变得模糊不清。如今,经过回忆的细细爬梳,希望我也能如开俄斯的西蒙尼德斯一般,赋予我所认识的书界人士他们所属的姓名。

“柏林坑”

我对这个世界最早的发现之旅，始于童年时柏林的非洲街，在一区区的房舍与灌木丛生的片片绿地之间。在我还那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经常让我独自在那些绿地上玩耍。

想来该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一区的“大男孩”们卖力地用铲子在沙地上挖一个大坑，约两米长两米宽，八十厘米深。一整天，我们这群小孩子都盯着“大男孩”卖力又辛苦地工作，有时也拿着我们的小铲子和小桶子想帮忙（尽管无用），却被那些拿着大铲子的严肃劳动者一再赶走。

终于完工后，众人决定为这个企盼已久的雄伟建物举行落成典礼。这场开幕式理当让在场的这一区孩童参加，所有的人都下到坑里，以颂扬这件伟大建设的成就。

所有在坑口的孩童都尖叫着、高喊着“哈啰！”然后纵身跳进这个大坑；较小的孩子则被抱下去或由已经在坑里的人接过去。而我，尽管也是最小的孩童之一，也经历到了这场群体的洗礼。我感到非常开心、安全，立刻挤到中间，在其他孩童身躯的保护与温暖下，和其他人一样站在那里，仰望上方，期待着即将展开的庄严仪式。

然而在外头，在这个守护着人的群体外侧却传出了一股骚

动,有什么主其事者始料未及的状况发生了:坑内挤满了抬头仰望的小人儿,都快挤爆了,而上方则站着那名“领袖”,他又开双腿、握着拳头、两手叉腰(这种姿态当时很常见)。这名领导整个工程、发号施令的“领袖”却还在坑外,而坑里已经没有空间了。所有的人都挤成一团,用焦虑的目光望着上方。为了让“领袖”进来,必须有个人出去。

我的呼吸停住了,我把身体缩得更小(我本来就够小了),避免别人注意到我,但终究还是免不了被驱逐出境。“喂,你,小鬼——中间的那一个!”

每个人都东张西望想知道是谁,我也一样——尽管我已经知道他讲的人就是我。

“就是你,那个戴着怪帽子的——给我出来!”

其他人都松了一口气,把我往外推,而我不得不把手伸给那个大孩子。他猛地一拉,就把我从这个舒适的群体里拉了出去,拉到坑洞外缘。我大声哭着跑开了。

我之所以成为一名独来独往的人并不只是因为“柏林坑”那次的经历,但那一幕景象却从很早开始就标志出了我往后的人生道路,在我的人生中一直有着一种对群体的强烈渴求。在我哭着跑过非洲街冲回家时,我把自己极度渴求的留在了那里,那就是:归属于一个能创造身份认同的群体。

后来有许多次我也都这么跑开了——几乎是“号啕大哭”地一次又一次体悟到自己是孤独自属的。而当我无法认同我自己所创立的或是我愿为之献身的团体,如:我的父母、教会、学校,

以及我将青年时期的一切精力投入其中的童子军青年团等共同体时，皆是如此。因为归根究底，我一直在找寻对某个团体、某个民族、某种文化以及对我自己德国文化的归属。

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生的，我被扔入当时的社会，但却清醒而成为其中觉悟的成员。直到战后数年，我才惊骇的直视这些惨绝人寰的罪行，这一切都是以其文化圈为名、由此文化圈的人所犯下的，而我原本却准备要融入它。

六十多年后的今日，当我回想起“柏林坑”的事件时，豁然察觉童年时那段影响深远的事件，不仅将我推向一条争议性的独立自主之路，且当年在轰炸阴影下、屈服于残暴独裁政治下的柏林，那一次的小儿之戏，简直以象征的方式嘲讽了这个历史大事件。柏林坑的那场游戏，孩童们屈缩着身子，彼此寻求慰藉的“民族共同体”，以及高踞他们上方的“领袖”，正是那动荡年代身处柏林的德国人的忠实写照。他们不仅要在夜间地毯式轰炸前逃往住家或所属行政区的地下室，而且早在之前许久，他们就已屈服纳粹统治下，屈身寻求他人所属的群体，以求相互削减自己的一丝罪孽——只要有人性、会政治思考的人，都能体认到这样的罪孽。

就此看来，当年我的群性正是那个年代德国典型的一种。而我对群体的渴求以及决定我日后发展，与之高唱反调的个人主义，也因为时代、纳粹极权下德国的特殊情况与战争等，而更加确立。我身为一名青年，无疑地必须彻底探讨这段发生不久、不容未加反省就认同的德国历史。

经过千折百转的道路，我才进入了德国的图书产业。我在德国杜伊斯堡(Duisburg)一家书店熬过了三年艰辛的学徒生涯后，就逃离了这个职业圈，转往瑞士山区。有一小段时期，我在一所相当专门的小学院研读纳粹德国的大众心理。

后来，对一名丹麦女子的爱情驱使我前往哥本哈根。我在丹麦努力学习丹麦语，在一所设计专业大学夜间部学习平面设计，在一间丹麦出版社的图书装订厂工作，并且很快升任为制作部组长。就这样，再一次，我努力以那些作为，希望能成为某个群体中受到大家认可与尊重的成员。而这一次的群体，则是我所钦佩、爱戴、富有包容性的丹麦中产阶级。

正当我的努力就要成功时——我与所爱的丹麦女子订了婚，婚期在望，而我任职的图书装订厂甚至打算让我成为合伙人，我在这个友善小国丹麦的生活即将步上正轨——然而再一次，我又得离开这处给我安全感的窝，前往法兰克福书展，应征几家出版社制作部门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我从哥本哈根坐上我的福斯金龟车，一路上我轻松以待，然而直到接近德国、丹麦边境的弗伦斯堡(Flensburg)时，从这里开始，随着德国马路展现的攻击性，使我越往南行驶，心情也越加紧张。当我从高速公路西边出口转往法兰克福时，这座当时已是“书客族”麦加圣地的城市举目在望。半途中我搭载了一名和我目的相同的便车客。花了好些工夫，好不容易找到车位停放我的金龟车，我们两人既好奇又情怯地来到了大厅。只见众多的出版人与书商依据自己的需求匆忙往返各个展出摊位，穿梭于成千上万本图书之间。这真是是个多彩多姿

的群体呀！这个群体的肤色、性别、服装、习性各不相同，但又不知怎的看似同属一个团体，甚至说着某种共同语言（尽管我们耳中所听到的是差异极大的语言）。有种难以言喻的东西将这些外表如此不同、举止又和“正常人”差异那么大的人们紧紧系在一起。

我在这里经历的，是一个由各种与书有关的人所组成的群体，其中有写书的、制作书的、行销书的、阅读书的（狂想理想的书、科学书、学习用书、实用书、娱乐用书、有用的书、无用的书、图画书、童书、摄影书；发人深省的书、享乐书、深具挑衅性的书、政治书；还有丑陋的、愚蠢的、诱人的、令人排拒的书；这些书我们不知该如何划定底线，而且在言论自由之下，它们也为人接纳并受到保护）。我初次造访法兰克福书展时清楚感受到的，正是对“书客族”这种特殊人种的印象。

在书展上，我很快就找到了符合我需求的标的：我在位于斯图加特的科学暨医学专门出版社，乔治·提曼（Georg Thieme）出版社，找到一份我认为薪资相当好的职位，主管制作事务。我是从哥本哈根搬到斯图加特，很快就开始了新的工作。

我离“法兰克福坑”越来越近了，这一次，并没有人扯着我的手臂将我拉出坑外，而毋宁是我亲近了这个“书客族阶级”。接着这一年半，首先我勤奋专注于医学专业书籍，处理它们的技术执行流程、核算费用、控管给印刷厂、装订厂的委托案，直到那些书各有三本样书完成，摆在社长办公桌上——而他总是“不吝”赐教给予批评。对于每一本在我照顾下诞生的书籍，从手稿到出版的漫长道路上我总是一路相随。身为制作负责人的我担负

起一种有如助产士的功能，自觉对每一本诞生的书负有重责大任，同时也对此深感自豪，仿佛这些书是我自己所写的。

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加入了法兰克福书展，成为大会工作人员，并在往后七年负责德国图书在海外的展出事宜，跨出了生涯上决定性的一步。从此展开了繁忙的差旅阶段，让我有机会了解从图书制作、图书行销到图书阅读等领域的整体产业状况。在拉丁美洲、美国、亚洲长达数个月的停留，与几乎遍历所有欧洲国家的各种计划任务等，有如法兰克福书展的微型沙盘推演。透过我那一千到四千多册、为数不等的德文图书展，我有机会认识一个又一个国际书市。为了顺利执行任务，我必须学习并具备组织能力，能够在每个截然不同的使用空间中建构各种展览；我必须拥有管理能力，才能领导各国展出地点所雇用的工作人员。我出现在这些国家的电视节目上，接受广播、报纸采访；此外，一切费用必须控制在预算内并妥善运用，因为政府里的金主，也就是德意志联邦政府外交部中管理预算的单位，可是铁面无情的。我努力了解我推展德国资讯的各种对象的文化，同时也开始对这些文化的文学感到兴趣。我学习如何对外表现，在各个使馆、部长、各国首长之前尽量扮演一个好角色。同时，我也培养出了与大作家、政治人物、知识分子来往对话的能力。

这一切可说是对法兰克福书展主席一职的能力养成，尽管这自然不是我在负责筹办德国出版品的国外展出时就可见的理由。没有人会料到——尤其我自己——这样的职场经验会将我带往何方。

一九七三年夏日的某一天，出乎所有密切关注当时书展主